

WEIYI TANSUO SHUXI
XINLIN DE TANXUN
QIAN LIQUN ZHU

文艺探索书系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著

灵魂的交流

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
认同。二者在精神上绝对平等。大家同
一的中国人，面临着
历史任务，面对卷同

样的文化背景，肩负着同样
的历史使命，我们必然有类
似的追求、探索、思考，类似
的矛盾与痛苦。研究鲁迅，不
可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旁观

者”态度，必定要“自己也找
在这里面”，在鲁迅那里“发
见我们自己”，与鲁迅进行心
的对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陆震伟

文艺探索书系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3 册 7 字数 264,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装 1—8,500册 精装 1—850册

ISBN7-5321-0068-5/I·44 定价：3.50元(平)

ISBN7-5321-0261-0/I·209 定价：5.65元(精)



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
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
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
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
真正知音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钱理群

编辑前言

最近几年，我国的文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气和活力。作家、理论家的想象领域和思维空间迅速拓展。这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文艺探索书系，正是在这样一个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应运而生的。

书系兼收创作和理论。创作部分，除了按体裁形式选编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作品外，还将考虑出版个人的探索作品集和某一方面的多人探索作品集。理论部分均为组织撰写的专题论著，其

中以探讨文艺基础理论为主，兼收对作家作品进行多角度考察和宏观性研究的著作。两者的编辑方法略有不同，但都要求贯穿着鲜明的探索精神。我们希望这套书能成为当代文艺变革的一个缩影，从中可窥探到作家、理论家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了解到作家、理论家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称这套书为“书系”，则是为了突出在整套书的选题结构和每一本书的逻辑结构方面对体系性的追求。

文艺创作，文艺研究，属精神劳动的范畴。精神劳动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探索精神是一种开拓精神。它体现了追求真理的虔诚和执著，体现了创造意识的清醒和强烈。社会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未知领域进入已知领域，除了探索这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捷径。文学发展史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学探索史，文学创新史。探索是科学发展、艺术繁荣的强大动力。

在创作实践中，探索作品和非探索作品，很难截然分开。凡是成功的作品，都一定会有探索的成分。“书系”突出强调“探索”二字，并不是要否定或轻视未入选的作品的探索价值。我们只是想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一些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从编辑思想来说，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积累和交流探索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想提倡和发扬探索精神，以造成一种宽松的、和谐的“精神气候”和文化环境，打破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中的某种消极的思维定势，更加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地发展。

探索也可以说是实验。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往往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获得的。探索过程是

实验过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它的探索成果一开始便要和社会直接见面，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定要有严肃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但既然是探索，有时就难免幼稚、粗糙甚至出现失误。我们认为，只要能从中获得新的认识，即使是失误，也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迈出的可贵的一步。当然，充分肯定探索精神，并不等于说具体的探索作品，包括这套“书系”在内，便无可争议。如果这样要求，是不符合探索的本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定要提高实践的权威性，把裁判权真正交给实践法庭，由实践来对探索的成果作出抉择。为了使社会主义文艺探索活动健康地、正常地开展，我们将坚持党的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交流，不同研究方法的相互切磋。同一论题，只要观点、方法不同，出书并不以一种为限。

编辑出版文艺探索书系，本身也是一种探索。我们等待着指点和批评。

上海文艺出版社

谨献给

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

青年朋友们

引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面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的，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

广泛参预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考察鲁迅作品在不同时代读者中的不同反应，以及鲁迅的形象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并从这一特殊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民族思想、心理、情绪的变化，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30年代中期鲁迅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人民第一次把他称作“民族魂”。此后，40和50年代，以至6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鲁迅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毛泽东在40年代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①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经典式的结论，不仅因为它确切地反映了鲁迅思想性格的实际，而且确切地反映了在民族救亡、奋起的40、50、60年代，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要求与心理。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任务未完成之前，鲁迅的“硬骨头”形象都将继续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

时间到了80年代，当今的中国人对于鲁迅的认识、评价（这些评价有的见诸于文字，有的则限于私人的口传范围），产生了各种歧义，鲁迅研究界也出现了多种角度的多种见解，以至于今天我们有可能明确提出“我之鲁迅观”的研究命题。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人们终于认识到，不同学术见解的关系，决不是简单到对某一种见解的肯定，必定要以否定（以至推倒）另一种见解为前提；相反，各种学术见

^① 《新民主主义论》。

解是从各自的角度接近了鲁迅本体的某一方面，因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在当今众多的鲁迅观中，引起本书作者注意的，是一部分当代青年对于鲁迅的如下观察：“每每捧起鲁迅的作品，我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鲁迅作品中的‘自我’。”“（他）既燃烧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火焰，又流露着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犹豫；既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品德的光辉，又表现出独鲁迅才有的坚韧中带有脆弱的气质”。和世界上一切“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样，鲁迅“博大深邃的思想中，最多地吸取了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最高地负起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重担”，“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得最强烈”，“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痛苦”，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有更大的空间”。由于鲁迅“探索解剖的是背负着几千年封建思想道德，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的灵魂，他精神世界的犹豫、痛苦，爱、恨、理智、感情”的交锋就特别“强烈”。鲁迅的“自我是立体的，多侧面的，伟大、普通亦有渺小，深刻、平常亦有肤浅。但我想，也许恰恰因为这样，他留给人们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历程中一个真实的横断面，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30年艰难跋涉的途径”^①。

本书作者对于这位敏感善思的当代青年的鲁迅观中的一些具体论点，不一定全部赞同，但却十分欣赏他所提出的观察角度，以为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深思的新的时代信息，并引

^① 李丽（北京师范大学1979级学生）：《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鲁迅研究》1983年第2期。

起了强烈共鸣。

这里所强调的“伟大而复杂的探索者”的鲁迅形象与“硬骨头”的鲁迅形象存在着内在的统一，追求的强烈与坚韧正是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表现。然而，观察视野、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40、50、6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的大集合体”^①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鲁迅的“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时间、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应该说这两种观察视野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封锁的40、50、60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70、80年代，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需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青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的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境，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我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从“民族”的单层面转向“个人”、“民族”、“人类”统一的多层面，

① 刘再复：《鲁迅研究的本质与精华解剖法的生机》，《鲁迅研究》1983年第1期。

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民族视野的扩大,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①。

在40、50、60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动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于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等等。人们看到的是“英雄”的鲁迅,却不重视鲁迅怎样成为英雄的探讨,有意无意地忽略鲁迅平凡的一面,更不愿正视作为英雄的鲁迅的内在矛盾与痛苦。对于鲁迅的这种“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观察方法,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思维习惯与社会心理的。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成的楷模去行动就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到了70、80年代,我们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现成的结论、模式,受到怀疑,进行重新审视,开始了全

① 对鲁迅作品中文学典型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例如,阿Q在二、三、四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到五、六十年代,人们把他看作是“农民”(或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且越来越重视阿Q必然要革命这一面。到了70、80年代,人们又确认阿Q身上所寄寓的“改造国民性”的意义,并且着重指出,所谓阿Q革命不过是要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前些年,对阿Q又有了新的观察点,有人指出:阿Q性格是“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诞性的象征”(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民族的大探索；探索真理的权利开始回到人民（包括作家、思想家）手里，并且变成了亿万人民的实践活动。于是，人们对鲁迅的观察由“结果”转向了“过程”。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也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感伤和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对鲁迅思想、心理、情感发展过程的着力探求，实质上是表现了人们在苦苦寻求鲁迅这样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与平凡的“自我”之间的心灵通道；鲁迅正是通过这种探求，真正深入到民族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心灵深处，转化为真正的精神力量。注重过程，就是注重思想的辩证法，心灵的辩证法^①；这是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的。

这样，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探讨，终于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与视野：把“个人”的鲁迅与“民族精神代表”的鲁迅，“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三者统一起来，把鲁迅作为一个伟大而复杂的探索者的形象，来研究鲁迅的各个侧面；探讨的重点，是鲁迅心灵的辩证法，并试图通过这一探寻，进一步探索20世纪我们民族思想、心理、情感发展的辩证法。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时，早就指出：一般诗人“主要是关心内心生活的后果和表现”，托尔斯泰“最关心的是心理过程本身”，“研究极其隐秘的心理生活规律”，即“心灵的辩证法”，而“谁要是不在自己内心研究人，那就永远不能达到关于人们的深刻认识”。

在研究目标初步确立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与“人类”的鲁迅三者怎样获得统一?这就是说,必须对鲁迅个人在人类与民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座标作一个历史的确定。

于是,有必要引入“20世纪中国与世界”这一概念。这是鲁迅活动的历史舞台;他的一切作为都受制于这个舞台,他个人的历史价值,他个人活动的历史特点,首先由这一舞台的性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所能提供的天地,所具有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而鲁迅个人活动又反过来给这一历史舞台增添独特的光彩。

“20世纪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过渡,它所要实现的是封建旧中国(以经济落后与政治专制为主要特征)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经济现代化与政治高度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大转折、大变革。与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相适应,20世纪中国将要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改造,创造现代民族新文化;实现中国人的根本改造,铸造新的民族性格。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全面变革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将要实现自己的觉醒、更新与腾飞,嬗变为现代民族。

20世纪中华民族的蜕变、崛起本身,即具有世界意义。列宁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亚洲的觉醒”即世界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的崛起问题。列宁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觉醒绝非孤立现象,是“亚洲的觉醒”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觉醒是“20世纪初所揭示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

的阶段”的一个标志^①。“20世纪世界”基本特征之一，是东、西方封闭体系的打破，各国孤立发展局面的彻底结束；20世纪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全面撞击中，同时发生着“融汇”和“隔离”两种历史趋向，在世界一体化与各民族多元化发展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鲁迅在20世纪中国的大变革、大转折，中华民族的大蜕变与大觉醒中，在20世纪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融汇、隔离中，将扮演一个什么历史角色？

鲁迅自己有过明确的回答。

在本世界20年代中期，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提出了“历史中间物”的概念：“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也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回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②。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无论是20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过渡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历史中间物”的位置。

他来自“旧营垒”，首先“反戈一击”——这是古老的旧中国最彻底的叛逆者，是封建文化封闭体系最勇猛的批判者；由

^① 列宁：《亚洲的觉醒》。

^②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同）第1卷第286页。

此而决定怀疑主义否定精神成为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性格。

他又首先“警觉”，“喊出一种新声”——这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伟大先驱者，由此决定着探索、创造、开放精神成为鲁迅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性格，同时决定着鲁迅时刻处于时代旋涡中心的历史“巨人”般的实践性品格。

但他仅仅是历史过渡“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的任务是“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年青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①。由此产生了鲁迅历史文化性格中的牺牲精神。

在鲁迅的反叛、探索与牺牲中，都伴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这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历史大变革、大转折中必有的历史大阵痛。

鲁迅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的中国的、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②——他的观念意识，他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情感特征，审美趣味，以及他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无不具有20世纪的时代特色；“个人”的鲁迅、“民族”的鲁迅，与“人类、世界”的鲁迅，正是统一在20世纪时代性这一基点上。

鲁迅一再声称，他“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③，这决

①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40页。

②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浓缩”性质，西方几百年的路程，我们几十年间即已走完。这决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同时拥挤着不同时代的思想家。这就是说，生活在20世纪的思想家，有的实际上是过去时代（比如19世纪、18世纪，以至更为远古的）思想家，有的则是“未来时代”的思想家。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如鲁迅所说，陷于“身首分离”的窘状（《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③ 《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

不是谦词，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过渡性质。鲁迅决没有终结一切，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以及他的个性，他的灵魂，都不具有至善至美的特性，他是无限的运动过程中一个有限的环节，他为无数的后来者铺平了“超越自己”的道路，他的生命价值正是实现在这种“超越”之中。

——以上概述的各点，构成了本书的基本观点。

三

研究目标——探索鲁迅“心灵辩证法”——的确定，同时也是研究方法的一种选择。

首先是“回到鲁迅那里去”^①。这就必须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及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及艺术表现方式，研究的任务是从鲁迅自我“这一个”特殊个体出发，既挖掘个体中所蕴含、积淀的普遍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又充分注意个体“特殊”的，为“普遍”、“一般”、“共性”所不能包容的丰富性。如果把鲁迅独特的思想、艺术纳入某一现成理论框架，研究的任务变成用鲁迅的材料来阐发、论证某一现成理论的正确性，那就实际

^① 这是王富仁同志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博士论文《〈呐喊〉、〈彷徨〉综论》里首先提出来的。他强调要“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他自己的创作意图”，“严格从这个特殊的个体出发”，“为鲁迅小说的研究寻求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本书作者十分赞同王富仁同志这一意见，并认为其意义不限于鲁迅小说研究，而涉及对鲁迅思想、艺术的独立价值的认识，以及方法论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普遍意义。